

前 言

国防经济学说史，是国防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是国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之一。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曾在 10 年前出版过一本《国防经济学 60 年》。那本书收集了大量资料，有选择地介绍了若干著名国防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理论观点，总结了国防经济学发展的一些经验，受到国防经济理论界和研究生的好评。但是，由于资料不足、研究不够、认识有限，很多东西没有把握。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防经济学是否有学派和如何划分学派的问题，无从涉及。所以，我们还不把那本著作称为“史”。时间已经过去了 10 年，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收集了一些新的资料；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新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我们作出新的努力。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了《国防经济学 60 年》的有关材料，删除了一些章节，修改了一些章节，重写了一些章节，增加了一些章节。在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产生的年代、国防经济学的学派、国防经济学的新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并以《国防经济学说史》的书名出版，供研究和教学参考。

全书共分 23 章，由库桂生主编。第 1、2、11、12、14、17、23 章由库桂生执笔，第 3、4、8、15 章由于德惠执笔，第 5、7 章由钱大林执笔，第 6、9、13、16 章由张洪辰执笔，第 10、18 章由全林远执笔，第 20 章由刘群执笔，第 19、21、22 章由王文华

执笔。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理论学科，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更是有限，加上作者的水平不高，书中难免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万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7 年 8 月 22 日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学科的区别和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毛泽东曾有一段名言：“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如果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就必须正确认识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特殊矛盾性。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处于军事科学和经济科学之间交叉地带的新学科。它所研究的是国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国防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它是经济学的一个门类，是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交通经济等学科处于同一层次的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环境，处于不同阶级、阶层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等等。这些因素使国防经济学形成以后的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如何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防经济理论的不同特点，并从中理出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就成为国防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任务。

国防经济学说史是一门史学。它所要阐明的基本问题是，国防经济学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又在怎样的条件下发展；它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性、同一性；它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动力；它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不同代表人物及其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等等。因此，国防经济学说史既是军事理论发展史的一个分支，也是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一个分支。

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家对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部分人认为，国防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工具分析研究国防及与国防有关问题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相当广泛，涉及到军费、国防工业、国防采办、军备竞赛、军品贸易、军事联盟等各个领域。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领域还存在“窄派”和“宽派”之争。“窄派”认为研究对象是国防领域的经济问题，而“宽派”则认为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应该包括国防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以及非常规暴力形式的冲突，如恐怖主义、暴乱、游击战中的经济学原则。对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些认识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的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是国防经济学形成、发展的历史。它着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国防经济理论观点，他们的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理论的特点和地位，比较各种观点的联系和区别，从历史的发展中研究国防经济学各种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寻找国防经济学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

由于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国防经济学的产生，即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的外部环境、内在原因、表现形态等。然后是这门学科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等等。至于对国防经济学的历史渊源的追溯，我们就只能把它作为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的一个“铺垫”或“前奏”。如果我们把“铺垫”或“前奏”作为国防经济学说史的主体来研究，这就可能本末倒置，影响国防经济学说史基本体系的合理建构。

第二节 国防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古代战争经济思想述要

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如果从 1914 年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算起，至今只有 80 余年的历史，但它的思想渊源却同战争、国防一样久远。国防经济理论来源于国防经济实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首领由选举制逐渐演变成世袭制；防御外敌的城墙和壕沟逐渐变成了国家的“围墙”。国家产生之后，设立了对内镇压、对外防御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即装备、费用、设施等经济因素。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认识战争与经济、国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些朴素的战争经济思想。

兵农合一思想在中国较早体现在姜尚的军事思想中。兵书《六韬》，对此就曾作过具体生动的描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之戟；蓑蓐笠笠，其甲冑也；？锺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故用兵之具，尽于人事也。”用通俗的话来说，战争中所需要的攻守器械，可以在人民的生产活动中发现，耕田用的犁可以作防御时的障碍物；马车、牛车可以作为营垒的防护物，锄头等器具可当作士兵使用的矛戟；生产时穿戴的笠帽可以作为士兵的盔甲，锄、锹、斧、锯、杵都可以作攻城用的兵器。这一番叙述，生动地说明了战争的器械同生产的器具，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平时可以用于生产，一旦战争临头，生产工具可以立即转化为战争工具，满足战争的需要。

关于兵农合一的思想，在古代西方国家也存在。例如，古罗

马国王塞维·图里乌(公元前578—前534年)规定,罗马公民就是士兵,平时劳作,战时打仗;武器自备,粮食自带。公民分为5等,各等级在战时所带的东西划分得清清楚楚。

富国强兵思想在中国较早地体现在管仲的学说中。他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他从当时的农业经济的社会基础出发,论述了富国的途径和强兵的方略。“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①富国的主要措施是发展农业、增加粮食储备: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他的这一思想,一直为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推崇。直至晚清,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激进派政治活动家如唐才常仍然宣传这种观点,认为:“夫欲树木者,必培其根,欲强兵者,务富其国。”^②

农战思想是古代重要的战争经济思想之一。商鞅在这一领域颇有造诣。他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③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力的强弱,王朝的安危,所以商鞅把务农人员和非务农人员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当作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志。国家不重视发展农业,就十分危险。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思想。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食

《管子·治国》。

《唐才常集·兵学余谈》。

《商君书·农战》。

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蓂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孙子的这些精辟思想，一直为后人所用。因粮于敌的思想也为古代西方军事家所推崇。

古罗马杰出的军事家凯撒（公元前 100—前 44 年）在与庞培作战时，曾说，“让我们以敌人丰富的资源解决我们军需的缺乏”，并多次在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思想。

军事屯田思想是中国战争经济思想的精华，一直指导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国防活动。最早提出屯田理论并从事屯田实践的是西汉将领赵充国。为了长期抵御匈奴的入侵，赵充国在边塞地区留下士兵和刑徒，开垦土地，生产粮草，屯田治塞。后来，曹操、诸葛亮以及明清时代的军事政治家等，都运用屯田的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

近代资产阶级战争经济思想述要

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寻找商品的海外市场，它们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障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对外采取战争这种暴力手段，砸开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的大门。战争不仅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繁荣富强，也使资本家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战争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从事的一种事业。一方面他们愿意支出一定的费用来扶植这种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通过这种事业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军事和战争问题，国防经济理论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了筹措国防经费的方法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理论主要包括下述几个观点：1. 战费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分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战争规模也逐渐扩大，完全靠参战者自备武器和军需品已经不大可能。工匠们一旦

离开自己的工作奔赴战场，其经济来源即告枯竭，必须由公众来供给，因而产生了“战费”。2. 国防开支是国家的首要职责。斯密在 1776 年写道：“国家的首要职责，即保卫社会使其免受其它独立社会的暴力或侵略，只能使用军事手段去完成。”为此，国家必须进行一定规模的军事拨款，所以，国防开支也就同时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责。3. 常备军的开支，是维护国家文明的条件。斯密反对“常备军是对自由的威胁”的说法，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战争是最高尚的艺术，文明国家若仅靠民兵来保卫国家，则要承担风险。不过斯密并不反对组织民兵，而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4. 战费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艺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斯密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采购费越来越高，训练、运输和补给等费用也大大增加。5. 国防费筹措的原则是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斯密认为，虽然国防是整个社会的公益事业，但国防费不能采用按人平均分摊的办法，而应根据各成员收入的多寡，采取“各尽所能”的原则。6. 文明社会维持兵士的费用，都是由非兵士的劳动者负担。因此，兵士的数目就不能超过这些劳动者除了维持他们自身及国家官吏所能维持的限度。根据他的推算，近代文明各国“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 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①。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在战费理论上，也有许多新见解：1. 公债筹款是促使战争发生的原因。政府靠公债来筹款比较容易，而且是在以后的时期中偿还。因此，增加了政府进行战争冒险的可能性。2. 筹措战费的合理办法是征税。靠征税来筹集战费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不把负担留在以后；二是可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59 页。

牵制政府不轻易卷入战争，或促使政府早日从战争中脱身。3. 战争与和平互相交替时，会给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他说：“长期和平以后开始战争或长期战争以后开始和平，一般都会工商业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它会大大改变各国资本以前投入的行业性质。这些资本在新环境使之成为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中稳定下来以前，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期间，很多固定资本将得不到使用，也许会完全损失，工人则不能充分就业。这种困难时期的长短要看大多数人是不是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投资行业。”^①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他的战争经济观浸透了唯心主义。他认为战争是对人口增长的不可缺少的限制。社会经济繁荣，民族精神高涨，会鼓励穷人不顾后果地生育，导致人口膨胀。人们为了寻求食物和生存空间，必然爆发战争。战争会增大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出生率，从而起到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战争会带来经济的短期繁荣，但战时经济增长越大，战后资本过剩越严重。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把他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带进了战争经济理论。萨伊认为，一个战士投入战争之前，社会（包括他的父母）对他进行了大量投资。从出生之后的衣食住行，到成长阶段的训练教育等等，花去了社会大量费用。他独立之后，社会应收回这笔投资。可是当他在战争中阵亡或致残，则不仅不能偿还投资，可能还要变成社会的负担。因此，战争耗费必须考虑伤亡者给社会带来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另外，萨伊不同意斯密把士兵称作非生产性工人的说法。他认为，士兵是“破坏性工人”，他们不仅消耗维持自身的产品的，而且，破坏别人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8页。

艰苦劳动的成果，而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仅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不少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一代枭雄拿破仑就有“以战养战，就地补给，多种手段聚财”，“打仗需要的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等著名论断。瑞士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对以战养战理论有相当透彻的认识。他说：“军队的统帅，应善于利用其所入侵的国家的一切资源，以保障其军事行动。”^①关于国家财政与战争的关系，他的认识不亚于各古典经济学家。他说：“决不应该忘记国家的财政状况。应把财政状况同决定战争胜负的其它军事因素等同看待。”^②

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他认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战争的经济基础在于民众，民众的经济支持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夺取敌人最富裕的地区是达成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方法；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是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军事经济思想述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国防经济学方面的专著，但在他们数以百计的军事学和经济学的著作中，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了社会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理论的优秀遗产，第一次揭示了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中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8 页。

《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 页。

一、经济是暴力的基础，暴力仅仅是手段，而经济利益则是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是本源的东西，战争（包括进行战争的物质力量）是由经济决定的，是实现经济要求的手段。阶级出现和国家形成之后，战争成了解决阶级对抗或向外扩张掠夺的一种手段。因此，战争作为暴力的形式，它同经济之间的关系“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同时，“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纠正了资产阶级学者们把暴力看作是目的，把经济看作是实现暴力的手段的错误观点，使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二、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便出现了为掠夺而进行的战争，掠夺财富和保存旧的经济制度是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私有财产，因而也就不会有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战争。战争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战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战争也将随着经济的一定发展而消亡。

三、武器装备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过时和贬值的速度加快。恩格斯说：“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取决于生产阶段。”^②他在《炮兵》、《步枪史》等著作中，通过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历史分析，揭示了武器装备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现代生产力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使武器装备的价值呈几何级数下降。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军事史和经济史共同证明了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5、18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4页。

四、军队的数量和质量、编制和编成，最终都是由经济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战争物质力量的军队，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全由经济决定。恩格斯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①军队的规模，军人的数量和质量，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也有密切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制度下可能召集的兵员数量在人口总额中的比重，要比经济落后的封建制度下可能召集的兵员数量高得多。因为前者提供的劳动生产力大大超过后者，从而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口脱离生产领域转入军队或其它领域，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由民用转入军需。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兵员数量与该国的人口密度成正比例；与交通条件的好坏成正比例；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在许多著作中，分析了军队的编制、编成、武器装备的改进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五、作战方法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革而改变。恩格斯在分析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②

六、有些新的经济关系首先在军队中诞生。雇佣制和薪金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广泛使用的经济关系，它对瓦解封建行会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可是，恩格斯周密考证后发现，这些经济关系首先是在军队中产生的。埃及在公元前就有雇佣兵存在，以后逐渐发展并将这一交往关系传入社会生产中，促进封建制度的瓦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8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62 页。

七、暴力既可以破坏经济、阻碍经济的发展，又可以起革命作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在历史上也起着一种革命的作用。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

八、军队的消费属于非生产消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军队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但不生产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末土地耕种者就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生命。士兵像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消费。”^②显然，马克思认为军官和士兵的劳动有益于社会安全，但不属于生产性劳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学说，揭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国防经济学的产生

尽管在古代就有战争经济思想和国防经济思想，但它们是零碎的、包含于其它学科之中的，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有本身的理论体系，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要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和代表人物，要有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分析和指导社会实践的方针政策。国防经济学产生于何时，这在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主要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00—301页。

以 1921 年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为标志

不少人的观点是，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21 年，代表人物是庇古，代表著作是庇古的《战争经济学》。持此观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日本国防经济学家石井洋。他在《日本的国防经济学》一书中说：战争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关系的科学，而全面研究战争与经济关系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它的先师是久负盛名的福利经济学家庇古。

1988 年中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防经济学 60 年》一书，也持类似的看法：“1921 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庇古适应上述客观要求，发表了《战争经济学》一书，系统地总结了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经济经验，叙述了战时经济运动的客观过程以及平战相互转换的一些理论原则，使国防经济学取得了最初的独立形态。”（第 10 页）该书认为，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重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中心议题，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想谋求世界霸权地位，发动了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往的战争只是处在“战争手工业时期”，战争手段比较简单，战争消耗量也不大，那时只是交战双方军队置于战争行动之下，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只局限于战费的筹集和战区的经济活动。而这一场战争，是在“战争工业化时期”进行的，它把交战双方的全体居民都卷入战争活动中，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都用来进行战争。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力的强弱，而更重要的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经济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时期，用传统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战时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也不能解决由战时转变到平时时期提出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空前加强，要求经济科学除了有研究平时状态经济过程的传统经济学外，还需要有专门研究战时经济

过程，以及战时向平时、平时向战时转化的经济学，而国防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也已经为战争经济学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因此产生了独立形态的国防经济学。

以 1960 年希奇的 《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为标志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不少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家认为，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60 年，其标志是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而不是 1921 年底古的代表作《战争经济学》的出版。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 1921 年底古的《战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经济，而不是国防经济。很显然，战争经济与国防经济是交叉关系。战争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使战时动员最大化，以充分保障战争胜利，即战争保障经济学。战争经济学的范围有防务与非防务之分，而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包括战时和平时的国防经济问题。同时，战争经济学缺少一个效益的概念。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如何对有限的国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选择，以实现最佳的国防经济效益，而庇古、鲁登道夫等人对战争经济学的研究均未涉及到效益问题。战争的效率以及战争对国民经济运行效益的影响，对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对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战争经济学很少考虑。

二是战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局限性。战争经济学主要是应用宏观总量分析法，数学方法应用很不够，基本上无量化分析。

三是战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有局限性。战争经济学一般只研究一个国家的战争经济问题，不足以提供一般性的结论。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应急性、对策性研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家认为，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 1960 年希奇的《核时代国防经济学》的出版为标志。该书研究内容相当丰

富，对国防经济潜力、国防财力、国防经济效益、军事联盟、国民经济动员与复员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在理论体系上支撑起国防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而且该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核时代的特点，涵盖了冷战时期西方所关心的国防问题。该书开始把现代数学例如运筹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国防经济学中，使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飞跃。

以 1914 年赫斯特的 《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

本书所持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均不同。取得独立形态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 1914 年，其代表著作是赫斯特在 1914 年出版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扩军备战进入高潮。各国均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战争准备，使正常的经济运行受到影响。各国经济学家纷纷研究和解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战时经济理论成为理论界的“宠儿”。赫斯特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出版了颇有见地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关于此书出版的背景、理论准备、主要内容等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详述。

需要说明的是，战争经济学既研究战时经济，也研究平时的经济准备；既研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也研究战争产生的经济原因，其研究对象仍是战争与经济、国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国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也包括了这些内容。不过，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在平时和在战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平时侧重于经济准备、军民结合、运行机制、经济效益等等。战时则侧重于经济动员、经济统制、资源筹集、资源配置等等。因此可以说战争经济学是国防经济学的初级形态，国防经济学涵盖战争经济学。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经济学与国防经济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第一篇 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

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问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它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发展的产物，也是国防经济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扩展结出的硕果。

这门学科的产生，是以英国经济学家 F·W·赫斯特于 1914 年出版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为标志。随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 A·C·庇古更加系统化的《战争经济学》。以这两本专门著作作为代表，形成了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首次为这门学科树起了历史的丰碑。

初创时期的国防经济学，形成了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以现实的战争为着眼点。在经济学家看来，战争这个“怪物”以其特有的方式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给民众带来“灾难”，他们以经济学家特有的眼光关注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实施和后果，就成为他们注视的焦点。二是以战争的资源筹措为主要内容。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中，战争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更为直接和明显，人们比较关注战费的来源和筹措。因此，资源的消耗、战费的筹措、战费对财政和经济的影响等，就成为初创时期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